

外

つ

下

7

下

藏书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家. 第7辑/齐鲁书社编. —济南: 齐鲁书社,
2003.5

ISBN 7-5333-1180-9

I. 藏... II. 齐... III. 藏书—文集 IV. 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831 号

藏书家·第7辑

本社编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180—9/Z·125
	定价: 10.00 元

目 录

藏书忆往

- 1 王英志 我珍藏的一本小书
8 戈 锋 “苦行僧”与藏书

书林一叶

- 15 黄 裳 来燕榭书跋(续五)
22 范景中 残书小记

版本谈故

- 32 黄永年 关于《唐女郎鱼玄机诗》
36 王世伟 吕无党抄校本《金石录》
40 来新夏 《两般秋雨盦随笔》与
《两般秋雨续随笔》
45 涂宗涛 朱印本《城东唱和词》
——莘楼藏书琐谈之二
48 温肇炘 温肇涵 章炳麟《小学答问》
篆文初印本

藏书讲座

- 51 林 夕 清刻本的鉴赏与收藏

雪泥鸿爪

- 62 柳和城 潘景郑题识的《四部丛刊续
编草目》

67	韦明铤	寂寞丛书楼
75	曹培根	翁同龢与常熟藏书家
80	吴景文	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盛衰
88	韦 力	藏书访古日记 ——苏州之行(续)
110	徐 雁	建国初的“救书”运动
118	辛德勇	倒霉的出版家
书海披沙		
124	谢其章	快炙背而美芹子 ——珍本杂志胥谈
130	官桂铨	云南喜得麻沙本
134	罗仁忠	在广州淘革命历史文献
144	张 谦	东京淘书记
147	淮 茗	马来西亚淘书记
读书偶得		
150	周国林	《书衣文录》的文献学价值
域外书情		
155	沈 津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日本汉籍书志
163	编后记	

我珍藏的一本小书

王英志

我不是一个藏书家，虽然也有好几架图书，但是无什么宋元善本，也很少值钱的线装书，大部分是建国以后出版的排印本书籍，其主体则是“文革”后出版的图书。“文革”前的图书我甚少，这些书大多纸张粗劣，装帧印刷质量也差，有的已被我处理了。但是有一本简朴的书，对我极其重要，我已珍藏了近四十年。这本书就是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 32 开本的小册子，六万来字，封面朴素，在中间偏上部分横系着六七厘米宽的绿色“腰带”，“腰带”上镶着白色线描的牡丹花，映衬着具有鲜明“郭体”特征的大小两行毛笔字：“读随园诗话札记/郭沫若”。版权页上注明“作家出版社出版”，“196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印数 00001 - 15000 册，定价 (4) 0.32 元”。翻开书的空白页是我三十八年前题写的“英志六四年十月十一日购于王府井”字样。

当时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刚升入二年级的大学生，平时经济拮据，一半生活费用靠助学金，所以很少进城；虽然喜欢书

籍,经过新华书店也会进去浏览一番,但掏钱买书的时候不多。只是我至今也不明白1964年10月11日这一天,为什么竟有鬼使神差,让我破费乘车,从西郊海淀大老远赶到市中心王府井去逛大街、逛书店,而且掏钱买了《读随园诗话札记》这本以后决定我人生命运的书。但我却记得当时之所以买下这本书,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崇拜名人,郭沫若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我在中学时就读过他的诗集《女神》,也看过他写的历史剧与小说,认为名人之作肯定有极高的价值;二是喜欢“札记”这种短小精悍的写作形式,我当时正热衷写短文,有一篇还上了《中国青年报》,所以想好好学习借鉴,以更上一层楼;三是《随园诗话》我

从没听说过,而我在中学时就是“诗人”,对与诗有关的书籍也极有兴趣,很想见识这本诗话是怎么回事;四是书价虽不算低,但也不算太高,相当于我当时一顿中饭钱,还可以“承受”。这样我就如同抱得美人归一样,喜滋滋地携书返回了燕园。

因为当时很少购书,故对此书十分珍惜。首先是工工整整地在书前空白页题了上述字样,以资纪念,然后用白纸包上书皮,免得污损。经过这样的加工处理,



我才开始认真拜读郭沫若的这本著作。此书还确实使我大开眼界。从书前郭沫若自序中得知：“袁枚（原注：1716—1797。按，实际是1716—1798，袁枚逝世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西历已为1798年1月3日），二百年前之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郭沫若少年时即已读过此书，而我年已弱冠，却刚刚知道世上有此书，甚觉惭愧，对郭沫若顿生钦佩之情。又知郭沫若此书的写作缘起是针对铅印出版的《随园诗话》：“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年5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兹主要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虽无衔接，亦有贯串。贯穿者何？今之意识。如果青胜于蓝，时代所赐。”郭沫若敢于对诗话名著发难，以“今日之意识”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批判，这尤其使我这青年学子钦佩万分！

借助郭沫若此书，我却了解了《随园诗话》的一些内容：一是标举论诗主张，如：于诗重性情而轻格律，所谓“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重真趣，所谓“趣欲其真，人必如此，而后可与论诗”；倡导语言通俗化，所谓“家常语入诗最妙”，等等。二是评价古代诗人，如：评白居易：“宋《荅塘诗话》讥白太傅在杭州，忆妓诗多于忆民诗。此奇论也，亦腐论也。”为白居易忆妓诗辩护。评王安石：“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对王安石其人与诗皆不予好评。三是引用与评价古代及当代诗作。四是记录诗坛逸事。还有些与诗无关的奇闻，等等。觉得此

书内容颇丰富,也很有趣味,值得读读。但郭沫若七十七条札记绝大部分是对袁枚及《随园诗话》持否定态度的,如称袁枚论诗“往往为偏致之论”,“袁枚是无定见的人”,“在封建社会中贩卖纲常名教”,“奸猾哉,袁子才”,“这是封建时代的正统观念,其中还含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袁枚本多迷信”,诸如此类。不过,当时我对郭沫若的批评并未怀疑,一是年纪轻,缺乏自己的判断力,二是尚未读《随园诗话》原著,无法了解其整体价值。对《读随园诗话札记》基本是“照单全收”了。

我原想到三年级上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题课时,再借来《随园诗话》对照郭沫若的札记好好读读,未料翌年秋升入三年级时却停课到京郊去搞“四清”,一年未到,北大“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发表,“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我们“四清”没结束即奉命返校参加“运动”。此后两年多积极投入“革命”,写大字报,打派仗,直到1968年底毕业没上过一节文化课,也根本没有心思去读古今名著,什么袁枚,什么《随园诗话》,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物极必反,后来渐渐身心疲惫,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至1968年底终于盼来毕业离校。在行前整理行李时,为减轻负担,那些已经厌倦的“文革”资料与小报等,都交给了废品收购站。但我留下了大学两年的教科书,这是我来过北大读书的证明(十年后又是这些教科书帮助我考取了北大中文系进修班“回炉”),而且留下了几本“文革”前出版的书籍,其中就有《读随园诗话札记》这本小册子。尽管当时郭沫若已斯文扫地,他也说过他的书都应该烧掉,但我还是很看重这本书。因为我又想到了《随园诗话》,我认为此生大概不会再看到《随园诗话》这本书了,那么《读随园诗话札记》毕竟引录了数十条《随园诗话》的文字,

可作为《随园诗话》的选本来读，何况此书很薄，份量不重，于是它随我“发配”到浙江东部山区的小县——新昌县中学任教。新昌县现在因为有一座大佛，还有被电视剧《笑傲江湖》选为外景地的镜岭秀丽山水，已成为“唐诗之路”上的“名县”了。但当时此地乃穷乡僻壤，整个县城就是一条又破又脏的丁字街，猪狗满街乱跑。于是我几乎不上街，教完课就躲在屋里看书。一是看中学图书馆里借来的书，实际上可借的书不多，大部分属“封资修”的书皆予封存；二是重翻我从北大带来的书，其中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就又看了两三遍。由于郭沫若头上的光环已在“文革”中破除，我对他早就不再崇拜了，而且我经过“运动”，思想也较当年成熟了不少，已有了属于自己的头脑，判断能力增强了，于是对郭沫若的一些评价开始质疑。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我因读《读随园诗话札记》而萌生多年的研读《随园诗话》原著的愿望，竟然在这所小县中实现了！

此事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或许是冥冥之中有神灵相助。那是我到中学两三年后，一天竟在校图书馆发现了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自序提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5月铅印出版的《随园诗话》。由于图书馆可借的图书实在太少、太没意思，于是我斗胆在堆放于角落里的落满灰尘的“禁书”中寻觅。这些书一捆一捆用麻绳绑着，但从书脊上可看到书名，我不顾灰尘呛鼻子，逐捆“检查”，原来大多数是“文革”前出版的世界名著，还有少量中国古代诗集诗选之类，这些书我基本上看过，所以兴趣不大。就在很失望的时候，忽然看到一厚一薄两本书的书名：《随园诗话上》、《随园诗话下》，当时我只觉得呼吸都停止了，怀疑是幻觉，难道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

夫”！我立即毫不犹豫地、兴奋地解开捆书的麻绳，把两册《随园诗话》抽出，再把其余的书照原样捆好。然后掏出手帕擦去《随园诗话》上的灰尘，让它好像是从陈列书架上取下的书一样。好在图书馆的李老师是新调进来的，也搞不清楚它的性质，未予刁难就放行，于是我顺利借到了六七年前由郭沫若所“指引”的一直想看的这部诗话名著。

这两册《随园诗话》在我身边放了好几年，通过阅读全书，觉得它并非如《读随园诗话札记》所云“神奇朽化”或大多为“陈腐之谈”。它强调诗歌本质乃抒写性灵，表现个性；倡导艺术独创精神，反对复古摹拟；主张语言自然，反对堆砌典故；标举诗歌的艺术美感，批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诗学观点；郭沫若的批判着实有些吹毛求疵了。如此读后感，与《读随园诗话札记》南辕北辙，这是我没想到的，但也仅是“读后感”而已，并未深究。

1978年秋，我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班，重返燕园，《随园诗话》还给了图书馆，但《读随园诗话札记》陪我回到北京。在我准备翌年报考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钱仲联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过程中，《读随园诗话札记》仍是我的参考书，尽管它的一些观点我已不赞同，但至少还有不少重要资料可参考。后来我能考取研究生它也是有功劳的。

1979年秋，我又携带《读随园诗话札记》来到苏州钱仲联教授门下，得以集中精力研读袁枚《随园诗话》及其他著作，一年后确定《袁枚“性灵说”新探》为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在撰写毕业论文时，《读随园诗话札记》还是我不可少的参考书，并在论文中论及，当然是从批评的角度。此后二十年我的科研重要内容之一

是袁枚研究，陆续撰写出版了《袁枚与随园诗话》、《袁枚诗选》、《袁枚》、《袁枚传》、《袁枚评传》等多部与袁枚有关的著作，同时主编整理了四百多万字的《袁枚全集》，还校点出版了简体字本《随园诗话》，我与袁枚的缘分可谓不浅。而此缘分的“牵线人”乃《读随园诗话札记》也。是它使我认识了袁枚，是它促使我阅读了《随园诗话》，是它启发我深入研究袁枚的诗学思想，是它激发了我全面探讨袁枚的兴趣。虽然以今日的观点来看，此书的学术价值已不高；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它却是一个路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南针意义。饮水思源，我将永远把它珍藏下去。

· 新书架 ·

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天津图书馆编 大 16 开 精装全三册 齐鲁书社出版 定价：

860 元

本书根据建国后第一部国家级古籍善本总目的稿本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油印稿本共收古籍善本三万六千余种，详细地著录了古籍善本的作者、刻印、抄校、行款、题跋以及流传等版本特征，深受文史、版本学研究者及古籍鉴定收藏者的喜爱和重视。但可惜未编索引，使用起来颇为不便。本书的编制（并将原油印稿本影印附录于后），解决了这个遗憾。是上述研究者、爱好者和图书馆人员案头必备之工具书。

“苦行僧”与藏书

戈 锋

我是一个书籍爱好者，既爱好读书，又喜欢购书和藏书。大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注意书籍的收藏，特别是中国古籍的收藏了。至1966年“文革”开始时，藏书数量约六七千册，小有可观。“破四旧”开始，我把一部分不太急需的书籍，以低价论斤卖给了废品收购店，剩下的一部分心爱和必读之书，就包扎起来，放到床底下、屋角等不显眼之处。由于我未遭抄家之祸，故这部分书籍得以保存下来。

虽然部分书籍幸免于人祸，但还是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有人特别是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突然闯入房间，因此不敢公开阅读。但我热爱读书，已成习惯，白天不敢读，于是就在晚上读。每当夜阑人静，星月交辉，万籁俱寂之时，妻儿已经熟睡，我一个人就在灯下苦读，直至深夜。就这样，我用两年多时间居然通读了整部《资治通鉴》线装本一百册，并断了句。其后又用二年时间通读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虽然书籍损失不少，然时间并没有白白地全部溜掉。

爱好和渴求知识是强大的动力。重新激起我购书热情的时间是1972年。当时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中央文化政策开始放

宽。这年冬初，长沙古籍书店重新开张，摆出不少古籍线装书供读者选购，且价格十分便宜。数年来的严密禁锢，一旦开放，我如饥似渴地抚摸着展读着那些心爱的书籍，真想把它都买到手。时值“文革”中期，一些人对“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犹心有馀悸，存观望心理，不敢冒然伸手。而我却壮着胆子，乘此时机，竭尽所能，以三、五元一部（少数部头大的书十元、二十元一部）的低价，先后购入约百部二千余册线装书，其中大部分是清代木刻本，内含善本书十余种、珍稀本书数十种。清代《说文》四大家的著作，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以及严可均、姚文田、钱塘、钱坫、钱大昭、席世昌、惠栋、钮树玉、苗夔、张惠言、张行孚、雷浚、叶德辉等多人的论著都是在此时买进的，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说文解字》书系。又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刻的王念孙训诂名著《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高邮王氏著作，郝懿行《尔雅义疏》、胡承珙《小尔雅义证》、魏茂林《骈雅训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以及康熙年间张氏泽存堂刻复宋本《广韵》、丁度《集韵》、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有诰《音学十书》、江永《音韵学辨微》、龙启瑞《古韵通说》、李汝珍《李氏音鉴》、《音韵阐微》、《中州音韵》等数十种音韵训诂方面的书，也都是于此时购进的，这就又形成了二个书系——“音韵学书系”与“训诂学书系”。这一万想不到的奇遇，使我大为兴奋。当时长沙古籍书店负责人看到我这样不惜一切地狂求猛购，就说：你一个人快要把我们的存书都买光了。

然长沙古籍书店的存书并不十分丰富，有些我想读的书在长沙买不到，于是就写信到北京中国书店、上海书店、南京、扬州、苏州等地的古籍书店进行邮购。当时从扬州古籍书店购进康熙年间万树堆絮园刻本《词律》，从南京古籍书店购进罗振玉

编纂的《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影印),从上海书店购进商承祚编纂的《殷契佚存》(1933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影印)、金祖同编纂的《殷契遗珠》(1939年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影印)。这后三部书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出版的,时间较晚近,然印数少,流传不广,加以后来的兵灾人祸,目前在全国除少数大图书馆外,一般图书馆已难见到。另外,我还托一位学术界的朋友从北京中国书店买到吴式芬编纂的《攘古录金文》,此书封面呈金黄色,版本宽大,印制精良,中有“恭呈御览”之句,是当时进呈光绪皇帝御览的,此亦为不易得之书。

我虽求书若渴,然并不盲目购书。因为我当时工资每月只有六十五元,除自身食用以及家用外,能够用于购书的钱已所剩无几。所以在使用这仅有的一点书款时,就态度十分审慎。当时我给自己的买书规定两条标准:第一,看是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第二,看是否有长期保存价值。

从这两个标准出发,我首先关注的是常用工具书的收集,如《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太平御览》、《佩文韵府》、《通志》、《文献通考》及其续编等书。其次是注意基本古籍的收集,特别是清代及近代学术名家的精校本精注本的收集。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期,考据风气极盛,其治学风气及方法影响及于近代,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中国古籍经过这一代又一代大师的整理考订,方成可读之书。第三是注意新学问的探讨,大力收集地下考古新发现的资料书及相关学术论著。这三个方面,概括了我购书和藏书的基本方向。

基本古籍中,《十三经》应是首选。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收集汉唐学人经说较为完备,我买了。中华书局已出的清人十三经注疏本,经过标点校订,便于披览,我全买了。

与《十三经》相妍并美的是先秦诸子书。先秦诸子中蕴含的

哲学思想与上古史料极为丰富。其所述古史，有的为《十三经》所失载，有的与《十三经》说法不同，故先秦诸子之书与儒家经典同样重要，不可不读。中华书局出版之《新编诸子集成》，多采用清代及近代学人之精校精注本，甚便阅读，我全买了。《管子》最称难读，我买的是郭沫若的《管子集校》，此书晚出，所集诸家说解完备，又时加按语，极为精当。《吕氏春秋》买了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此书也是集大成之作。

古文字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上古史的基础。研读《十三经》及先秦诸子书，必须具有坚实的古文字学基础，方能排除疑难，真正读懂。这就是上文所述，我在购书时，为什么把《说文解字》方面的书、音韵学方面的书、训诂学方面的书作为首选之书的原因。

然近百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地下出土之古文字资料、文物资料日益增多，蔚为大观。面对这种形势，做学问、购书，也必须与时俱进，使已经掌握的传世文献知识与对地下新出土古文字资料之研究相结合，通过相互印证，才能有所发明。所以，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这是极有见地的。近数十年来，“甲骨文字学”、“金文学”、“简牍学”之所以成为显学、研究之热点，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殷墟甲骨文之出土及研究解决了商史中的许多问题。金文的内容更加丰富，或可与传世史籍相印证，或可补史籍记载之缺失，均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战国秦汉简帛文字对于研究上古史、秦汉史更至关重要，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些重要的战国秦汉简牍的不断出土和发现，不仅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而且弥补了许多文献的不足，纠正了某些史料的讹误。

基于以上认识,所以有关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文字的书藉,就成为我关注的重点。通过多年的搜求,有关这三方面的重要工具书资料书已基本收集齐备。此外,甲骨、金文研究名家以及后起学者研究有成者——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唐兰、于省吾、商承祚、徐中舒、胡厚宣、丁山、杨树达、容庚、戴家祥、马衡、陈邦怀、裘锡圭、李学勤、姚孝燧、高明、赵诚、常玉芝、王宇信、陈炜湛、李圃、蔡运章、陈直、劳干、贺昌群、李零、何琳仪、白川静(日本)等人有关甲骨文、金文、简牍文字的论著论文集也已基本购齐。

在传世文献中,除《十三经》、先秦诸子书外,《二十五史》应是价值极高最基本的典籍之一。《二十五史》及其补编,以及贯穿全史的通论性、考订性著作、唐宋、元明、清代史料笔记丛刊等均已购置。

此外,在我的藏书中,还有关于目录学和版本学方面的重要工具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基本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共约数百种,不能一一备述。

回顾五十年来个人的藏书史,不能不在我的心头掀起阵阵波澜,兴奋与感慨,满足与悲怆,每每交织于心头。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间,我始终在低工资收入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坚持买书,虽然为此而缺乏营养,影响健康,并经常引起家庭关系紧张,但我已经把购书、读书和藏书做为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也就在所不惜了。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常往返书店数次,才能下决心把一部书买回。有时书店摆出一部好书,依据我的两个购书标准来衡量,是必须购买的。我站在书店的柜台前,仔细地端详着反复地摩挲着这书,欲舍不能,然而摸摸钱袋,一文莫名,于是就怀着依惜之情勉强走开了。夜里睡在床上,反复琢磨,这部书还是要